

本书荣获 **新加坡哈佛基金会** 赞许、推荐



赞助人：新加坡共和国国务资政吴作栋先生

新加坡哈佛基金会于2005年3月21日成立，该校友基金会旨在推动非政府机构（NGOs）中经营和管理领域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使新加坡成为非政府机构的区域总部。

咨询委员会由工商管理硕士课程52年毕业生、资深校友欧阳熹先生担任主席（嘉德置地副主席、建屋发展局前任主席），副主席是公共管理硕士课程74年毕业生林子安先生（肯尼迪学院梅森学者项目、吉宝置业执行董事长）；会员包括南洋理工大学荣休校长詹道存博士（剑桥大学、新加坡总统理事会会员）、亚太管理学院05年毕业生陈振南博士（英国布兰德福大学荣誉文学博士、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常任秘书）和李庆言先生（伊利诺斯州西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新加坡航空公司主席、马来西亚纺织协会主席）；以及联合董事许文辉先生（工商管理硕士课程76年毕业生）、李建威先生（工商管理硕士课程78年毕业生）和张顺才先生（工商管理硕士课程69年毕业生）。

*This book is 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 **HARVARD SINGAPORE FOUNDATION**

*Patron: Senior Minister Goh Chok Tong, Republic of Singapore*

**The Harvard Singapore Foundation** is an alumni foundation founded on March 21, 2005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 and the promotion of Singapore as a hub for the headquarters of NGOs.

**The Advisory Board** is chaired by our senior alumnus Hsuan Owyang MBA'52 (Deputy Chairman, CapitaLand and former HDB Chairman) and deputy chairman Mr Lim Chee Onn MPA'74 (Kennedy School Mason Fellow and Executive Chairman, Keppel Corporation); with members President Emeritus NTU Cham Tao Soon PhD (Cambridge, Member of Singapore's Presidential Council), Dr Tan Chin Nam AMPI05, Hon DLitt (Bradford, Permanent Secretary of MICA) and Stephen Lee MB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llinois, and Chairman of Singapore Airlines and Great Malaysia Textiles); and with Co-Directors led by Koh Boon Hwee MBA'76, Lee Keen Whye MBA'78 and Anthony SC Teo MBA'69.

## 连士升生平

文·连亮思医生



我的父亲生于1907年5月24日。他的故乡在中国福建省，福宁府，福安县，秦溪村。他的出生地是一个偏僻贫穷的农村。就像当时中国的许多典型的贫苦小农村一样，连年不是受到旱灾的祸害，就是遇到水灾的厄运。生活艰苦，不在话下。一般人的知识水准低落，从那时乡村高等学府只有小学可以看出来。

父亲就是生长在这个国家衰败，民不聊生的时代，在科学方面或医药卫生方面都非常落后。当时人们的寿命平均是30岁左右。虽然父亲一生经历了连年的战争，患上了多次的大病，然而他能最终能活到66岁而逝世于1973年，除了归功于科学的进步及后来安居于新加坡之外，最重要的是他有异常的求生毅力和坚强的斗志，再加上他人格的修养，使他能逆来顺受去忍受各种天灾人祸，即使大难临头，还能处之泰然，屹立不倒。

父亲的祖先都是务农，到了他曾祖父的时候，才在科举上崭露头角，做读书人。他祖父，叔祖父，父亲也继续举业，而且有相当成就。我的祖父更是以教书为业。父亲的小学教育，开始就是从祖父那儿接受指导。到了8岁那年，我祖父不幸去世，家徒四壁，只留下

十一块大洋和几亩薄田。父亲到了十五岁时，他母亲也相继逝世。父亲幼年丧失了双亲，但并不因为自己无依无靠而堕落为沦落人；相反的，由于没有身外之物的拖累，又没有双亲的牵挂，不幸的遭遇倒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也许是因为生长在所谓的“书香之家”，父亲从小的志向是读书。我祖父给他在学问上开了途径，我祖母更是慈祥和蔼的鼓励和督促他，给他培养了发奋图强的精神。父亲十一岁在家乡小学毕业后，没钱到外地升中学，但是他仍不气馁，反而刻苦自修，把宝贵的中国文学遗产尽量吸收。留在家乡学习古文的那几年，是父亲自认为他一生的学问打下最稳固基础的阶段。

1922年，父亲15岁时，我祖母去世后，靠几个亲戚朋友的帮助，开始了他的离乡背井的生涯。当时他已经懂得他的人生目标——朝向学术进修及人格陶冶前进。升学的第一步是到霞浦县。在经济万分困难的环境下，他半工半读修完中学。这段期间，父亲开始学习英文，同时受到该校校长人格的影响。那校长“生活简朴勤俭自持，十年如一日”。父亲一辈子就按照着这个方针做人。

19岁那年，父亲到福州读书一年，打算把数理化这些现代知识充实一点才去投考大学。这就是他一贯的作风，对我们子女的教育也是如此——宁可慢，更重要的是巩固基础。但是父亲的兴趣更倾向文史。所以二十岁那年，父亲到了北京，进了燕京大学，开始是学理科，第二年转修社会科学——经济学。

20岁到30岁这十年间，根据父亲自己所说是他生平最快乐的日子。其中一半是花在燕京大学，另一半是在国立北京图书馆和政治学会图书馆。这段日子，一来有机会埋头读书，给他带入治学的途径，二来有机会结交才高学博的师友，所以这十年总使父亲念念不忘。

那个时期正是中国政治动乱不安的时期。一般学生，年青人，开始对自己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关心。生长在那个时代的父亲由于师友的引导，再加上环境的影响，也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像一般热血的青年一样，父亲关心国际时事，及社会改革问题，所以对搞文艺工作相当积极，从而奠定了他一生专走文艺路线的道路。

大学毕业后，大多数的时间父亲在北京图书馆钻研，写作，还翻译了整套经济史学的名著。对读书兴趣永远是那么浓厚的父亲，北京图书馆给他的乐趣是无穷无尽的。更重要的是，从书本中他能跟古今中外的学者、伟人学习。他最喜欢读传记，其中最注意的是这些成功人物的治学方法和个人修养的关键。其中对他影响最深之一的要算戊戌政变领袖的人物——梁启超先生。父亲对他的描写如下：“他博闻强记，笔锋常带感情，到了晚年，他倾全力来研究中国历史。他生平爱谈政治，更爱研究学问，尤其喜欢识拔青年。”这段对梁启超的描写，可以说也是父亲生平的写照。

在北京期间，父亲跟大学的一位同学结婚并生了大姐侨思。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父亲逃到香港避难。30岁到40岁之间，可以说是在逃难中度过。在这期间，大妈不幸去世，父亲再娶，并生了我们兄妹五人，亮思、仁思、藩思、文思和萧思。1942年，父亲从香港带领了一家大小逃难到越南，经河内，西贡到达茶荣省，隐姓埋名，直到战后。

在这逃难期间，生活的清苦波动是不必说了，而父亲在战争中险遭不测也不只一次，不过不论在怎样困难的环境下，父亲却能保持“塞翁失马”的精神，积极面对艰苦危难。所以在战乱，逃难的生活中，还不断读书，写稿，翻译，和继续自修。

1949年父亲带领了全家到新加坡定居，并且在报馆当主笔。当

时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言论的自由大受限制，再加上一些小人的陷害，父亲有好几次差不多被驱逐出境。幸亏父亲平时的人缘很好，每次都有贵人从中帮忙，化险为夷，要不然他的后半生可能要改写了。

在百忙之中，父亲把剩余的时间花在读书和写作，并陆续出版了传记，散文集和游记单行本。这些著作很多是在三更半夜当大家都熟睡时写成的。这种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刻来用功，一直保持到最后几年因为健康关系而停止。不过偶然半夜起来还会看到父亲拿着一本书看得入神。就这样的靠一点一滴的累积工夫，在新加坡二十多年来，先后出版了二十多本单行本，而还未出版的稿件更是不少。

父亲在青年时期对改革社会，从事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兴趣。在我四岁时，他在我的纪念册上提了“为民前锋”四个大字，并写了这一段文字：“余拟授以演讲术及近代史，俾他日侧身政治舞台为民前锋。昔小彼得以二十四岁之青年负英国首相之重任，论者恒归功于良好之家庭教育。余虽不如查侯，只愿儿子能为小彼得一偿生平之愿望。”但是战争之后，看到政治面目的丑恶，再加上生活在一个言论受限制的殖民地国家，所以改变他对政治的热忱，专心在治学与做人的修养方面下工夫。既然中国问题是个敏感问题，他转移目标，专门研究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的三杰——泰戈尔，甘地，尼赫鲁。前后共花了十七年，完成这三个人的传记。

父亲对自己的衣服外表并不注重，可是对于书本的出版要求非常严格，分外认真，单从他作品的工整目录，就可以看得出来。

1961年，新加坡政府委派了父亲担任责任重大的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替政府各部门的空职挑选适当的人选，也包括推荐应当升职的公务员。父亲是这个委员会唯一受中文教

育出身的成员，所以对那些从中文学府出身的应征者，特别关照，尤其是当他们的英语讲得不流利时，父亲尽可能给他们机会发挥其它优点，以弥补他们口才上的缺点。这个工作花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终于到1966年，因为身体健康的关系，而辞去了这个任务。为了表扬他的贡献，新加坡政府在1963年颁发公共服务纪念奖章给他。

除了报馆工作外，父亲也很活跃於其他社会工作。他曾担任南大筹备委员会的委员，也被新加坡大学委任为理事会的委员。他曾任南洋学会会长前后长达十年，也担任了中国学会副会长多年。在他担任南洋学会会长期间，常常举办演讲会、聚餐会，出版书籍、学报等活动，并且四处为学会筹款，使学会能在经济充裕的情况下活动。

父亲不太喜欢运动。他唯一的健身方法是散步。家里大小也常常陪他去散步。在散步时所谈论的不外是做学问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也许从小营养不良，父亲一生经历了多次大病。第一次在北京患上了大肠疾而大动手术，把大肠切去一大段。1956年受印度政府邀请到印度访问，归来后得到了黄疸病，接下去是严重的糖尿病，那一次险些送命。1966年心脏病发作而进医院疗养了一个时期，1969年切除胆石，并因为十二指肠溃疡而把胃肠割除了一大部分。

父亲终于在1973年7月9日逝世。刚好是从中国游历回来后两个星期。当时由于肠胃的吸收能力减少而患了贫血症再加上旅途的疲乏，心脏的衰弱，父亲终于在六十六岁走完了生命的路程。一个生长在预期寿命只有三十年的人，同时经历了连年的战乱，做过了多次的大手术和患上了几个严重的长期疾病，他居然能一生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尽心尽力，为家庭，为子女，为读者，为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人生应该是没有遗憾的。

我多年前就常看到他的文章，深深地受了他一股真诚和狷介的意识感动，到了在南大评议时第一次晤面，恂恂温雅，有中国儒家的传统，谈吐起来，谦谦卑卑地，但却守住定见，不轻易随波逐流，是一位文质两全的君子。

——魏雅聆医生《连士升纪念文集》的〈怀念连士升先生〉

在各种场合里，不论口头的谈论或文字的表达，他一向抱着隐恶扬善的态度，有时赞扬一个人，可能夸张了一点，那是为着鼓励的缘故，却从来未挖人家隐私一句，损坏已建立的可贵友谊。总之，他把爱字当作人群和睦共处的基石，促进世界大同的捷径。

——新加坡先驱画家刘抗先生《连士升纪念文集》的〈紧密的朋友—连士升〉

在他的《漫谈记者和史家》文章中，连先生说：“一个负责的记者等于一个胜任的史家，做记者须学有专长，对人生观、宇宙观应有自己的见解，才能替读者指示迷津，才能指导读者走上正确的路。”我想，连先生本身就是这么一个有学问，能指导读者的好例子。

——教育家刘蕙霞博士《连士升是谁？》

我们从连士升先生的作品中，不难发现他的散文很早就潜藏着一种全球化的跨越与整合，从欧美的政治家、思想家、音乐家，到亚洲的哲学家、文学家等，他在思想上很早就显得开放、多元与活跃，并能配合全球化时代的步伐，创造出散文意境的人文关怀意识。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许福吉博士

## 海·滨·寄·简

第一集 物华集

第二集 天宝集

第三集 人杰集

第四集 地灵集

第五集 落霞集

第六集 孤鹜集

第七集 秋水集

● 第八集 长天集

连士升百年诞辰纪念版

ISBN 978-981-4200-65-3



9 789814 200653